

新见圣历二年《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文献价值

李 淑

内容摘要:2014年发现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刻于武周圣历二年(699)二月十五日,是目前所见完整《陀罗尼经》幢中时间最早者。《陀罗尼经》在唐代有多个译本,并以出现石刻经幢的形制在全国各地广泛流布。经对勘发现,文水县圣历二年间所刻《陀罗尼经》的译本,是唐《开元释教录》中所记佛陀波利译本之别本——即佛陀波利、顺贞等所译经与地婆诃罗、志静所译咒的合本。这个没有在《大藏经》中独立呈现的唐代版本,其实是流传于宋、明二代的代表性版本。

关键词:武周 圣历二年 陀罗尼经 经幢 版本

唐朝是中国佛教发达的时代,佛教文献因此成为同期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以下简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不仅是中古时期的宗教文本,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该经在唐高宗时首次被译为汉文,此后又经多次重译,且诸个译本皆传于后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常以经幢的形式供养,在全国各地广泛流布,对社会亦产生重大影响。2014年山西省文水县发现了一座武则天圣历二年(699)所刻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幢经(以下简称“文水经幢”),现收藏于文水县博物馆^①。文水经幢的发现,不仅有利于理解中古时期的佛教信仰与佛教流行状况,也对传世文献具有比勘校对的价值。通过对勘又可反观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译本流传情况,推进我们对该经不同译本流传的认识。

文水经幢为石质八角幢,幢身高177厘米,幢腰长103厘米,幢座与幢顶不存。八面等宽,每面宽12.5-13厘米;二、三面,三、四面交接棱处及幢底部略有磕损。铭文每面5行,为阴刻楷书,直行左读,间疏不等,每行60余字至100余字,字迹清晰,书体端美,是比较典型的唐楷。文水经幢刻写于武周时期,落款

^①感谢文水县博物馆馆长梁晋红女士,她将该经幢拓片赠与孟宪实教授,孟师惠示拓片,从而使得本文有条件进行。荣新江教授给予本文多方面指导,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忱。

时间为“𡗗曆二𡗗二𡗗十五𡗗”^①，文中“天”、“地”、“人”、“日”、“月”、“年”、“国”、“圣”等字皆用武周新字书写，即“丙”、“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

文水经幢第一面第一行，题首“𡗗賓𡗗沙門佛陀波利奉 制譯”（此句为小字，约为正文一半大小）与正文起首“如是我聞”之间，原留有约正文十五字的空白，后空白处加刻了“伏願 大王萬福”六字，字体浑圆，书体与幢身正文不同，字号亦较正文大一倍左右。经幢第八面末行，在经文末句“伐折𡗗 𡗗”与经幢落款之间，原留有约正文九字的空白，后加刻了双行“御史中丞曹通家内平善”、“光啓三年正月廿七日重建”字样，其中“家内平善”由于空间受限，已经挤到了落款与前行正文的书缝之中。在落款“書生趙大雅”、“𡗗曆二𡗗二𡗗十五𡗗 𡗗”之间，原留有约正文四到五字的空白，后加刻了双行小字“重建後”、“合村平安”字样。落款前后所加双行小字，字体一致，然字形粗拙，刻写远逊于经幢正文。

据文水经幢正文的书体、落款时间、尤其是武周新字的使用，可以证明，此石幢刻写于武周圣历二年。经文结尾后的双行小字，书体明显与正文有异，且行文安排受到原文留白的限制，可知是经幢制作完成后加刻的内容，根据小字提及的“重建”时间，应为光启年间在武周的石幢上进行加刻（若是重刻经幢当不会使用武周新字）。而小字中提及的“重建”当为重建经幢的附属设施、举行相应的仪式，设施有可能包括基座与幢顶等，但幢身仍旧为武周时期所造原物。

一、唐代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据《大智度论》，“陀罗尼”（dhāraṇī）意为“能持”——持善而不令善失、不令恶生^②。又《瑜伽师地论》将陀罗尼分为四种：“一者法陀罗尼，二者义陀罗尼，三者咒陀罗尼，四者能得菩萨忍陀罗尼。”^③其中以咒陀罗尼最为广见，故“陀罗尼”亦指真言、密咒。陀罗尼经典属于密教经典，现存二百四十馀部陀罗尼经典中，超过九成属于密教部。

幢作为佛教名物，本指伞状垂筒形、饰有羽毛锦绣的旌旗，在原始佛教的四部阿含中常常见。后因幢有“高举”的特点，在佛经中亦引申为佛法威势，以妙法、善语为幢。《增一阿含经》中更有《高幢品》，专论佛法如幢，降服苦厄烦恼。

从现有文献和实物来看，以石柱为“幢”并刻写经文的形制，始见于唐代，

①为便于说明经幢的刻写形态，本文引用经幢中的文字使用繁体。

②龙树菩萨造，鸠摩罗什译，王孺童点校：《大智度论》上册，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

③玄奘法师译：《瑜伽师地论》第四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156页。陀罗尼的分类亦有诸种说法，此处选从较为普遍之说。

且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相伴而生^①。后世虽偶见道教、景教采用石刻经幢这一形制,然绝大多数经幢仍为陀罗尼幢。陀罗尼幢的产生,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内容密不可分。这部经典主要讲述了善住天子因寿将尽,获悉将入地狱并受诸恶道轮回之苦,求助于天帝。天帝向如来求问解脱法,如来为之宣讲陀罗尼之广大威力、咒语内容及供养方法,善住天子依持而得大解脱。《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直接提出了将陀罗尼“安高幢上”^②的供养方法,结合中国的石刻传统,催生出“石幢”这种经文刻写的载体,既能长久保存,又能将其再“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窄堵波中”^③,以合佛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消除罪业的便利,不仅能轻而易举地免除轮回诸恶道的痛苦、乃至得正等正觉,而且不会发生退转。这是该经能够广泛流传的原因所在。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唐代传入中土后,得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认可和赞助,多次下诏翻译,所以该经及相关咒语、仪轨可见多个“奉制译”、“奉诏译”的版本。唐代宗时期还特地颁布诏令,命僧尼诵读,《请太原号令堂安像净土院抽僧制书》中有“太原府大唐兴国大崇福寺中高祖神尧皇帝起义处,号令堂请安置普贤菩萨像一铺;净土院灌顶道场处,请简择二七僧奉为国长诵《佛顶尊胜陀罗尼》”^④;《敕天下僧尼诵尊胜真言制》中有“天下僧尼令诵佛顶尊胜陀罗尼,限一月日诵令精熟。仍仰每日诵二十一遍。每年至正月一日,遣贺正使,具所诵遍数进来”^⑤。同时,也有朝廷重臣、文化名人书写流传,《舆地碑记目》有“《佛说尊胜陀罗尼咒》,牛僧孺,八分书”^⑥;《通志》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元载书,凤翔府”,“《尊胜陀罗尼咒》,柳公权,未详”^⑦;《文苑英华》也载有独孤及《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赞并序》^⑧。普通百姓诵持供养,也留下诸多石刻资料。白居易的《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中便有“坏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⑨之语,此经“幸冥福”功用巨大,可视作当时的社会共识。

①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页。Liyong Kuo, “Dhāraṇī Pillars in China: Functions and Symbols”, ed. by Dorothy C. Wong and Gustav Heldt, *China and Beyond in the Mediaeval Period: Cultural Crossings and Inter-Regional Connections*, New Delhi and New York: Manohar Publishers and Cambria Press, 2014, pp. 351-385.

②③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第351页b。

④《代宗朝赠司空大辩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大历五年十月一日牒”,《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第0837页c。

⑤《代宗朝赠司空大辩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五“大历十一年二月八日内谒者监李宪诚宣”,《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第0852页c。

⑥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2册,第518页b。

⑦郑樵:《通志》卷七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74册,第515页a,第523页b。

⑧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八二《赞》,中华书局,1966年,第4134页。

⑨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六九,文学古籍出版社,1955年,第1703页。

唐代留下了大量陀罗尼石刻,石幢作为其中最特色的形制,亦遍布大江南北,成为唐代陀罗尼信仰广泛流布的明证。虽然文献记载中,常有具体名目的经幢数目呈现,如《续通志》中载七座^①,《宝刻丛编》中载两座等^②,但所载并不全面。譬如,张少悌所书《陀罗尼咒》石幢,在《续通志》中记为“崇圣寺《陀罗尼咒》石幢,张少悌书,行书,天宝七载,长安”,而《金石文字记》则进一步指出:“崇仁寺陀罗尼石幢,张少悌行书,天宝七载五月,今在西安府。尊胜陀罗尼石幢,天下多有。不具载,此以少悌之名而存之。”^③张少悌是盛唐时代著名书法家,可见一部分石幢是因为书写精美等原因才被记录下来的。《金石文字记》卷六所记的一座经幢:“《尊胜陀罗尼经》,正书,咸通四年八月拓本,经刻于石幢,漳州押衙王嗣造,建州司户参军刘鏞书。”^④这个记载,就是此前未曾记录的。

又如《续通志》卷一七〇有“《尊胜陀罗尼经》,胡季良书,正书,会昌元年,湖州”^⑤,并未言明是经幢。而朱彝尊《湖州天宁寺尊胜陀罗尼石幢跋》有言:“湖州天宁寺……相传寺有《尊胜陀罗尼》石幢一十四座,今其八尚存,文可辨识者:一建于大中元年十一月,后题刺史令狐绯姓名。一建于大中二年八月,后题刺史苏特姓名,书者曹巨川也。一建于大中十二年四月,书者凌渭也。一建于会昌元年十一月,书者胡季良也。一建于咸通十一年三月。又断石一,平望芮文琛立,后题乾符六年四月,盖平望驿时属乌程澄源乡宜阳里。”^⑥可知胡季良书《尊胜陀罗尼经》亦为石幢^⑦,且根据朱彝尊对湖州天宁寺的记载,在胡季良所书经幢的周围,存在一个《陀罗尼经》幢的“建筑群”。通过朱氏的列举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唐代盛行《尊胜陀罗尼经》崇拜,而《尊胜陀罗尼经》经幢则成了重要的文化景观^⑧。

唐代建造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幢,有不少留存至今。刘淑芬著《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一书,列出经过实测的唐代经幢三十三座^⑨,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统计的唐幢有八十二座^⑩,其中大部分都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又据赵改萍粗略统计,山西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也有

①嵇璜、刘墉等:《续通志》卷一六七《金石略》、卷一七〇《历代石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94册,第629页a、第629页b、第632页b、第633页a、第689页b、第691页b。

②陈思编:《宝刻丛编》卷六、卷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1页、第887页。

③顾炎武辑:《金石文字记》卷四,《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第236页。

④《金石文字记》,第438页。

⑤《续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94册,第691页a。

⑥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530页。

⑦上文中对《续通志》、《宝刻丛编》的石幢统计,唯以文献中直言为石幢者计数,很多记载为“石刻”的,其实很可能也是石幢,这里没有纳入统计。

⑧刘黎明:《中国古代民间密宗信仰研究》第四章第一节《唐代陀罗尼经幢》,巴蜀书社,2010年,第143-154页。

⑨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第54-57页。

⑩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王玉清:《陕西所见的唐代经幢》,《文物》1959年第8期,第29页。

三十餘座^①,等等。文水县新发现的经幢,尚不在大家的视野之内。

目前所见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时间最早者为陕西省富平县之“永昌元年八月”(689)幢,然损毁严重,幢身仅剩一半^②,缺乏可供研究的价值。文水经幢虽稍晚十年,时序排在第二,然幢身和经文保存完整,又加刻有光启三年(887)重建、祈福之款识,流传序列清晰,具有很高的文物、文献价值。同时,文水经幢也具有版本特色,可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传译研究提供最新文献资料。

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译本

文水经幢刻于圣历二年,此前,《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有据可考的译本概有五个^③,于此稍作说明。

按照唐定觉寺沙门志静为佛陀波利译本所作经序^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首次翻译是永淳二年(683),罽宾沙门佛陀波利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带至长安,高宗令杜行顓与沙门地婆诃罗(日照三藏法师)共译此经。但这一时间的追述是错误的。沙门志静所作序言,特别强调了佛陀波利于仪凤元年(676)拜谒五台山,得到文殊化身指点,随后西取《陀罗尼经》还至中土的神异故事,具有宗教神话色彩,或是因此,混淆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传入中土的时间。《开元释教录》卷九便指出志静序言的问题:“其序复是永昌已后有人述记,却叙前事,致有参差,此波利译者不可依序定其年月也。”^⑤

志静序言又云,首次翻译完成后,佛陀波利奏于高宗,请将此经颁行天下,高宗只返还梵文本经书给佛陀波利而已,于是佛陀波利与西明寺沙门顺贞等诸僧再译此经。由此“前后所翻两本并流行于代,其中小小语有不同者幸勿怪焉”。不仅如此,根据志静的说法,至垂拱三年(687),他到洛阳,与地婆诃罗再次修订、重翻了此经咒文的部分。

既然沙门志静序言中关于首次译经的时间并不准确,那就应该继续讨论。据唐弘福寺沙门彦惊为地婆诃罗译本(自译本)所作经序:

此经以仪凤四年正月五日,朝散郎行鸿胪寺典客令杜行顓,与宁远将军度婆等,奉诏译进……无几,敕中天法师地婆诃罗,于东西二京太原弘福寺等传译法宝。而杜每充其选,余时又参末席……于时永淳元年五月

①赵改萍:《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在山西的流布》,《山西档案》2012年第2期,第42-43页。

②《陕西所见的唐代经幢》,《文物》1959年第8期,第29页。

③终唐之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译本共有八个,然善无畏、不空、若那的翻译时间都晚于文水经幢的建立时间,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④沙门志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第0349页b-c。

⑤沙门智升:《开元释教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卷,第0565页b。

二十三日也。^①

此序所记时间与《开元释教录》相合：“《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初出与日照等出者同本，仪凤四年正月五日译毕……后日照三藏奉诏再译，名《佛顶最胜陀罗尼》，《大周录》云‘《佛顶尊胜陀罗尼》日照三藏译’者，误也。”^②

据此，《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早在仪凤四年(679)正月五日由杜行顓、度婆等人奉诏译进。随后，地婆诃罗在弘福寺奉敕译经的过程中，杜行顓又与之参详，于永淳元年(682)五月二十三日新译得一本，译名为《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经》，《开元释教录》在解释《大周录》的错误时，将原作中的《佛顶最胜陀罗尼》改称为《佛顶尊胜陀罗尼》。

佛陀波利在垂拱三年前之所以要进行二次译经，主要原因是高宗没有将前次译成的汉文本交还给他，换言之，这个版本应该被留于宫廷之中。而后佛陀波利根据高宗返还的梵文本，译成与宫廷存留本“有小小语不同”的汉文本进行流通。故而，虽然沙门志静言道“所翻两本并流行于代”，其实流行于代的是佛陀波利与沙门顺贞等再次译出的译本。

综上，圣历二年以前，《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译本与时序为：^③

1. 仪凤四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大唐京兆杜行顓奉诏译^④(以下简称“杜行顓本”);

2. 永淳元年，《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经》，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诃罗奉制译^⑤(以下简称“地婆诃罗奉制译本”);

3. 弘道元年(683)前^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罽宾国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⑦(以下简称“佛陀波利”本);

①沙门彦棕：《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第0355页a-b。

②《开元释教录》卷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卷，第0564页b。

③《开元释教录》卷十所录之顺序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唐朝散郎杜行顓奉制译(出《大周录》第一译)。《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诃罗译(《拾遗》编入第二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大唐罽宾沙门佛陀波利译(出《大周录》第三译)。《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经》一卷，大唐中天竺三藏地婆诃罗于东都再译(《拾遗》编入第四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或加咒字)一卷，大唐三藏义净译(新编入录第五译)。右五经同本异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卷，第0600页a)

④《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第0353页a-0355页a。

⑤《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第0357页b-0361页c。

⑥以佛陀波利译经时唐高宗尚在，则应在弘道以前。

⑦《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第0349页a-0352页a。

4. 垂拱四年前^①，《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诃罗译^②（以下简称“地婆诃罗自译本”）；

5. 证圣元年（695）后^③，《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大唐三藏沙门义净奉制译^④（以下简称“义净本”）。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翻译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看，一为佛说此陀罗尼的缘起，为汉文意译，二为陀罗尼（咒语）部分，为梵音音译。

将这五种译本的内容对比来看，存在不小的区别。汉文意译的缘起部分，主要差别在于用语和表述。杜行顓本作为初译本，相较于后出的译本，一些名物概念采用了音译，如释提桓因（天帝）、阎浮（南瞻部洲）、阿罗诃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浮屠（高塔）等，译法比较朴素，并有避讳^⑤。内容最丰富、字数最多的版本为地婆诃罗奉制译本，此一版本充分展现了原始佛教经典重复延讲的特点，并记载了善住天子前世之因果故事，以及蔚为详尽的诵持供养仪轨，为该本独有，它本皆不存。与此相对，其后的地婆诃罗自译本，或为求流通之便利，大加删削，为诸本中最简短者。佛陀波利本与义净本，为五个译本中比较折中的译法，同时两个译本之间也很接近。而陀罗尼部分，经过诸多译者的反复对勘，各版本在发音、用字上有较大的区别。

三、文水经幢版本

文水经幢所刻之经、咒，在版本上都有自己的特点。经幢题名“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下注译者为“罽宾国沙门佛陀波利奉制译”。据经幢本身的题名与译者，文水经幢所刻，采用的译本应为弘道以前佛陀波利奉诏所译的版本，然经过细读，并与《大正藏》中所载佛陀波利本进行比对，可以发现诸多问题。

首先是经幢题目，乃取义净本所译之“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而非佛陀波利本所译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译者之下，“奉制译”也与原本“奉诏译”

①《开元释教录》卷九曰：“《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经》一卷（第四出，即与前经同本，日照后欲归国，于东都共沙门慧智再译，前缘后法，二文并广）……以天皇仪凤初至天后垂拱末，于两京东西太原寺（西太原寺，即今西崇福寺是也；东太原寺，即今大福先寺是也）及西京弘福寺译大乘显识经等一十八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卷，第0564页a）知地婆诃罗自译第二本的时间当早于垂拱末。

②《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第0355页a-0357页a。

③据《开元释教录》卷九，沙门义净“以天后证圣之元乙未仲夏还至河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卷，第0568页b），译经当在此后。

④《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第0361页c-0364页b。

⑤《开元释教录》卷九曰：“有庙讳国讳皆隐而避之，即世尊为圣尊、世界为生界、大势为大趣、救治为救除。译讫奉进，皇上读讫，顾谓顓曰：‘既是圣言，不须避讳。’杜时奉诏，以正属有故而寝焉，荏苒之间，杜君长逝，未遑改正，其经遂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卷，第0564页b）

有别,这是因为,一则义净译经在证圣之后,二则刻经时为圣历年间,据《唐六典》卷九“中书令”条,“天后天授元年,以避讳,改诏为制”^①。故用语必然发生改变。

其次,从翻译的经文内容来看,除个别脱漏、衍文、错字外,文水经幢所刻经文,较之佛陀波利本,省去了“与诸大天游于园观又与大天受胜尊贵”一句(与义净本同)、“临急苦难堕生死海中众生得解脱故”一句、“亦为一切诸天子故说此陀罗尼印”一句、“故来修学若有受持读诵是陀罗尼”一句、“或堕畜生阎罗王界”一句,另加入了“持此陀罗尼亦复如是”一句(与义净本同)。从删去数语中存在与义净本相同、加入之句与义净本相同、题首采用义净本译法的现实情况来看,可以合理推断,由于佛陀波利本与义净本极为接近,在流传抄写的过程中,佛陀波利本经文已经受到了后出义净本的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文水经幢所刻的音译陀罗尼咒,和佛陀波利本所载之咒语相去甚远(但也不与义净本相同)。以文水经幢所刻咒语与其前五个版本加以比对,发现文水经幢之咒语,非常接近地婆诃罗奉制译本的咒语,除了读音,在用字方面也很趋同。譬如,namo皆译作“那谟”,余本则作“南谟”、“曩谟”、“纳谟”;samanta皆作“三漫多”,余本则作“娑曼多”、“三满多”、“三曼多”;gati皆作“揭底”,余本则作“伽底”、“藁帝”、“咖底”。相比之下,佛陀波利本所载之咒语,反而是与文水经幢咒语相差最远的一个版本。个中缘由,参考沙门志静为佛陀波利本所作序言,或可了解:

至垂拱三年,定觉寺主僧志静,因停在神都魏国东寺,亲见日照三藏,法师问其逗留,一如上说。志静遂就三藏法师咨受神咒,法师于是口宣梵音,经二七日句句委授,具足梵音一无差失。仍更取旧翻梵本勘校,所有脱错悉皆改定,其咒初注云“最后别翻”者是也。其咒句稍异于杜令所翻者,其新咒改定不错并注其音,讫后有学者幸详此焉。^②

由序中可知,佛陀波利本之咒语,于垂拱三年(687),经沙门志静、地婆诃罗重新勘译,另成一本,造成了“其咒初注云‘最后别翻’”的状况。志静此次翻译咒语是在地婆诃罗的指教下完成的,那么经志静改定的佛陀波利译本的咒语部分翻译与地婆诃罗译本非常接近,也就顺理成章了。

因此,佛陀波利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其实应细分为两个版本:一为佛陀波利与沙门顺贞及诸僧所译之经、咒本;二为佛陀波利、顺贞等所译经汇同志静改定咒语的合本,这个合本最初流传时注明了咒语“别翻”,但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别翻”之语就被省略了。文水经幢刻经,正是采用了第二种合本,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题名佛陀波利译本的文水经幢,咒语部分却与地婆诃罗奉制译本大体相合的原委。

^①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274页。

^②《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第0349页c。

今见《大藏经》中,佛陀波利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之底本,标明为高丽本,并注云“此陀罗尼与宋、明本大异,故今宋本及明本各别附载于卷末”^①,注中“陀罗尼”即指陀罗尼咒。我们将宋、明本陀罗尼咒,与文水经幢的咒语部分进行对校,便可看出三者之咒语除个别用字有异外,整体上对梵语翻译音节的把握,以及咒语的汉语发音,几乎完全相同。可以确认采用的是志静改定的咒语。这说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流传至宋、明时期,所谓“最为流行”的佛陀波利译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应该是上述分析两种版本中的第二种,即合本。

通观佛教历史,一经多译的诸译本在后世传播中最流行者,或以时间为先,或翻译为优。综合《大藏经》中诸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来看,佛陀波利本得以在后世流行^②,除却佛陀波利五台山遭遇神迹的记载为其流传有造势之功外^③,翻译上的成功为流通提供了便利这一要素也不应忽视。杜行顗本为诸译本之先驱,然译法稚拙,梵经特色突出,在汉地传播必然受到限制。随后地婆诃罗奉制译本则经文过长,在流通中不甚便利。应是注意到这个问题,地婆诃罗方才单独自译一本,然为求简洁,又有删削过度之嫌。佛陀波利本经文在杜行顗与地婆诃罗二本基础上译得,参照了前人成果,译文的准确性、可读性皆已到位。再观其后义净本,并未对佛陀波利之文有所突破,时间却已过去二十年来年,此间佛陀波利本传播已广,义净本难再替代。即便如文水经幢之经文,受到义净本之影响,甚至采用义净本的译名,然经幢题首标示译者,仍为佛陀波利。

在此基础上,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圣历二年的文水经幢,将《开元释教录》中所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陀波利译本之别本——即佛陀波利、顺贞等所译经并志静改定咒语的合本,以石刻史料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个没有在《大藏经》中独立呈现的唐代版本,其实是流传于后世的代表性版本。故文水经幢作为刻于公元699年的实物,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文水经幢于圣历二年刊刻,至光启三年“重建”,已过去二百余年,期间还经历了会昌灭佛的法难,但经幢仍旧保存下来。光启是唐僖宗年号,此时的唐朝正逢大动乱的年代。光启三年正月,以御史中丞曹通为首,乡亲们筹资重新修缮、安置这座陀罗尼经幢,祈愿“家内平善”、“合村平安”,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经幢题首下加刻的“伏愿大王万福”,大王所指或许正是此时的河东节度、陇西郡王李克用^④。但是,动乱时代虽有祈求平安的愿望,社会经济能力却有

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第0350页(注)。

②《开元释教录》卷九明确记载当时佛陀波利的译本“比诸众译,最为弘布”(《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卷,第0565页b)。

③刘黎明:《中国古代民间密宗信仰研究》,第147页。

④“(中和四年七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累表诉屈,请讨汴州。天子优诏和解之,就加克用阶特进,封陇西郡王以悦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719页)

限,于是在旧有的经幢之上加刻一些祈祷文字。这一方面显现出某种无奈,另一方面表明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甚至包括这座经幢,在当时当地依然具有影响力。

唐代佛道两教皆盛,虽然道教在皇家的仪式性中占据上风,但佛教的社会影响即便是武宗灭佛后依旧不减。在传统的认识里,唐代佛教以明心见性的禅宗为魁首,但在普通民众的现实需求中,还是简单朴实,讲求福报效应的宗派、经典更具吸引力。唐代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一再翻译,以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陀罗尼经石刻、石幢,都向我们展示了唐代陀罗尼信仰的兴盛。《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虽然是密教经典,但它简单的供养方法,深厚的福报,对民众形成了广泛的吸引力。

佛教传入中国,随即发生的佛教中国化问题,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重要课题。汉传佛教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之一便是佛经的汉文翻译。汉文佛教文献,近代以来获得陈寅恪等大家的率先研究,如今已经取得众多成绩。然而,新文献的出现,依然是相关学术研究的重要推进力量。文水经幢具有时代早、流传有序的特点,因此除了像本文这样,可据之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版本做进一步研究之外,也能够为唐代陀罗尼信仰流布的认识提供新参考。

【作者简介】李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史。